

# 从“网络政见”到“网络键政” ——修辞学视野中的“入关学”

姚云帆

## 一、“入关学”是不是“学问”？

2020年初，一个神秘的表达在国内有一亿多用户的知识分享网络社区“知乎”中弥散开来。在此之前，“入关学”作为一门融合了社会学、国际政治理论、世界史和网络段子的“键政之学”，变为无数青年参与网络时政评论时最乐于采用的论述模式。在“入关！入关！”这一口号开始成为网络热词时，“入关学”已经成为一套复杂却自相矛盾的论述体系，并产生了“曹学”“逃（陶）学”等各种变体。最为有趣之处在于，“入关学”的创始人“山高县”，却已经在网络审查和激烈网络言论的双重挤压下封号“归隐”。

此刻，值得追问的地方在于，“入关学”在何种意义上称之为一种“学”？当我们进入“入关学”芜杂而多变的论述中时，脑海中首先感受到的，并非认真的学理推论，而是一系列独特的隐喻：“摸鱼”“挖参”“内卷”“大House”“辩经”……显然，不熟悉“入关学”的初学者，立刻会陷入“新名词”的汪洋大海之中。“入关学”与我们教科书和学院中的“学问”并不相似。在正统的学术体系中，一门完整的学科或学问，必须包含固定的研究领域、完整自洽的论证逻辑和相对稳定且可被严格定义的术语体系。显然，“入关学”并不符合这些要件。表面上看，“入关学”的研究对象十分稳定。“入关学”的创始人，如“山高县”、曹丰泽等人，似乎对“入关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精密的界定：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美国及其盟友，被比喻为“大明”；而被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不断“绞杀”的中国，被比喻为“蛮夷”和“女真”，而“入关学”就是研究我国如何突破“大明”的“犁庭扫穴”（多重“绞杀”），进入富庶的“中原”，夺取全球霸权的策略学研究。这似乎说明：“入关学”不过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分支：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种策略分析和一种论点。但是，随着网络论战的扩大，“入关学学者们”为了“论证”自身研究的正当性，开始弱化“入关学”的实证性，拓展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将世界史转化为一种“蛮夷入关，逐鹿中原”的历史。例如，在描述英美获得世界霸权的过程时，有的“入关学学者”也将英美国家作了“蛮夷化”处理：

日本人普遍认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五个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考虑到这五国在国际上的互动，平时虽有争吵，但遇到挑战时立即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协调一致，像极了一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们价值观都一致了。它们之间的认同，甚至要超过大陆和台湾。我认为“五眼联盟”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匈奴，“美国”是相当于匈奴王庭，“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有点类似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之类的部落，其他仆从国分为高级消耗品（北约，日本）和低值易耗品（土，韩）。<sup>①</sup>

<sup>①</sup> 由于“山高县”已经被封号，以上言论引自网友“收集者”制作的“山高县”言论集。

通过对“蛮夷入关史”的梳理，以及其“入关”策略的分析，“入关学学者”不仅能为所谓自居“女真”的中国“入关”的“野蛮正当性”寻找历史依据，而且可以借鉴其经验和策略。但是，这样一种论述，却又消解了“入关学”作为一种策略学的意义。有趣的地方在于，“山高县”没有真的把“大明”看成真正的文明人，而是把它看作占据了文明地位的“老野蛮人”，正因为如此，自居为“女真”的中国只能以“合理的野蛮”对抗“更早出现的”“匈奴式”的“野蛮”。既然“入关学”是作为“蛮夷”的中国反击致胜占据文明中枢获得世界霸权的策略学，一旦“入关学”只承认入关的有用性，拒绝了“入关”的正当性，任何意义上的“入关策略”必然只有短暂的有用性，而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和长效性。<sup>①</sup>某种程度上，“入关学”作为一种“学问”或“知识体系”，从“山高县”缔造它开始，就沉陷在自我消解的历史循环洪流中。

因此，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入关学”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追求学理上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知识体系的构建。相反，“入关学”包含着对其“学”的定位的消解和嘲弄，这种消解和嘲弄背后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而简单对待这种情绪，正襟危坐地将之看作一种“学问”或“潜在学术”，将会忽略“入关”话语最为精彩的地方。网上对“入关学”的驳斥雄文：《评入关学：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就陷入了把“入关学”学理化的问题，在并未深入阅读“入关学”言论的前提下，“自我对象化”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sup>②</sup>

那么，“入关学”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入关学”是一种修辞学实践，它并不试图建立其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是诉诸特定受众的情感，赢得网络“键政”辩论的优势地位。

## 二、为什么需要修辞：中国网络议政转型中的“入关学”

“入关学”实际上是较为纯粹的一种“网络键政”行为，尽管其创立者“山高县”被封号，但曹丰泽等人仍然活跃于网络公共空间，并创立“关宁锦评论”等专栏和公众号扩大其影响。也有人认为，曹丰泽试图通过“入关学”的流量将“入关学”主流化和网红化。但是，与之前诸多网络议政空间相比，“入关学”与现实政治的距离相对较远。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成为了国人公开议政的重要渠道之一。在2008年以前，能够熟练使用网络进行思想交流和公共议题讨论的人群基本属于社会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士，其现实身份和网络身份相对统一。大量的网络议政者往往抱着如下心态参与议政：首先，可以规避现实法律和行政规范对政见表达的限制，达到畅所欲言的效果；其次，可以摆脱物理空间的限制，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更多人。与此同时，当时传统的公共空间仍然能有一定摆脱资本逻辑的运营空间。网络议政者往往与出版等传统公共空间相配合，扩大其言论的影响力，构造线上线下一线交互的人际网络，从而实现其文化资本、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本的最大化。在这一时期，学院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都立足于网络平台，扩大其文章和言论的影响力，而其受众的文化水平及社会地位与发言者差距不大。通过对现实社会议题的网络延伸，这些精英形成了排除大众议政的“公共空间”。应该说，流行的“启蒙话语”和较为晦涩的“新左派话语”都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线下言论的“线上变现”，第

<sup>①</sup> 山高县云：“世界必将属于中国，但不需要骄傲，现在这个时代，霸主的寿命只会越来越短，我们也同样会老去。”

<sup>②</sup> 参阅邢麟舟，《评入关学：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2020年4月26日），全文引自微信公众号“无隅”：<https://mp.weixin.qq.com/s/ZZOemG4p6F1BFmwX7mf73A>。

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那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这些文化人和知识人在知识界的地位很快决定了他们以“学术”或“文化”为名，构造起来的网络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往往直接以“知识”的面目完成对受众的说服，并为追随者承认。

换句话说，早期互联网的“键政”是政治到键盘的延伸，其话语也是政治话语：尤其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在网络中的延伸和普及。这种话语的特点在于，它首先以“学”的面貌出现，并在现实社会中凭借自身学术人和文化人的社会身份，产生其说服效果。但是，这样一种以“学”为中心，不借助修辞技术而产生网络影响力的话语模式遇到了如下挑战：首先，在2008年以后，互联网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产业化趋势，在此之后，对资本的吸引力，而不是知识分子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地位，成为衡量网络影响力的前提条件。这就淘汰了一批以同仁组织为形式，以学术和文化体制中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网络议政群体。其次，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以“经术掾政治”的议政群体倾向于和政府、智库和大的传媒集团结合；热心于“学术”和“思想”的群体获得了学术体制的支持；而走商业化路线的知识人则与银行、房地产和互联网集团等大资本结合。前两个群体能够依靠政府和学院体制获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逐步失去了公共议政的热情，即便在网络上发声，也和所在的利益群体的立场紧密结合，以个体或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增加个人的网络影响力。这就让修辞效果，而不是单纯的“学术”或“知识”水平，成为网络议政的首要考量。而国家利用审查机制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管控则进一步加剧了修辞的重要性。这一审查机制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很多亚文化群体，如网文写手群体（起点、晋江网），网络球迷组织（虎扑）、各种网剧、电影和漫画同好会（字幕组）必须面对网络监管的直接压力，这间接让以前不属于政治领域的议题，逐步转化为政治议题。而为了争取民意和监管者的注意力，这些群体更关注修辞效应和传播效果，而不再关心自身的政治表达是否合乎理据或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为了合理规避审查机制，大量的双关词、反讽、隐喻等修辞格成为议政表达的必备技能。最后，随着移动终端和微博、微信等新的社交媒体工具的出现，依靠长篇论述阐述严密观点的BBS和博客不再成为网络议政的主要形式，而问答形式、百字限制的“微博体”和图文互动形式等多样的网络表达方式，使得理性的学问只能让位于对修辞技术的推敲。

与上述互联网大趋势的改变相比，网络议政者的人群和目标则产生了更大的变化。笔者初步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网络政见”到“网络键政”的改变。之前的网络议政方式是现实议政的互联网延伸，也高度依赖现实社会中与议政相关的知识和学术，这些知识和学术基本依赖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学科衍生出的批判理论等学科而产生。因此，这些网络议政最终需要在网下“实现”，无论是社会的演进还是某种观点在学术界的成功。所以，“网络政见”的实施者往往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其受众也是文科青年，他们或者想利用“思想”改变社会，或者想利用“学术”变成同他们偶像一样的知识界领导者。只有这套知识有着社会效应，“网络政见”群体才能感到满意。但是，“网络键政”的实施者们不同。他们理解政治和社会的知识不一定是人文或者社会科学学说，甚至，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政治知识和学问是否能理解世界，他们进行政治议论的目标是产生网络效应和在网络论辩中获胜。因此，“网络键政”的核心不是线下的社会效应，而是网络社群效应，而激发这种效应的手段，并非复杂的政治知识，而是有效的网络组织和修辞效应。例如，最近数年的贴吧“粉红”出征，并不依靠政治知识的辩难，而是依靠重复实施者相信的观点和调动更大规模拥护者的情绪。

当然，“粉红”群体仍然不是标准的“网络键政”，因为“粉红”群体“出征”所依赖的“正

当性”论据仍然相对简单。这些论据不过来自比“思想”和“学术”更为简单的直观感受和政治教条。相比之下，“入关学”则依赖更为复杂的思想资源，其论述方式也看起来更像一种“学问”。但是，如果探根究底，“入关学”仍然不能算是一种成体系的学问或“科学”，而是一种修辞技术的有效应用。

要说明这一点，必须提及一个重要的网络议政形态。这个形态就是2008年至2014年对网络政论形态影响甚大的豆瓣网“数卷残篇”团体，其核心人物通过意解休谟、安兰德等西方思想资源，重新判别中国政治史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套奇特的政治思想史解释体系。表面上，“数卷残篇”仍然是一个“网络政见”团体，但其论述方式却为后来“网络键政”的出现提供了极好的范本作用。这种范本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数卷残篇”有着鲜明的论辩冲动，却不在乎依靠“知识”的严密和渊博来确立其说服力。表面上看，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伪装出一副贯通中西的形貌，并通过刻意修改翻译屈从己意的手法，以及任意裁断史事，多发激进“爆论”的方式，来吸引那些试图博出位，或对现实生活不满的青年文化和社科工作者。其次，“数卷残篇”第一次以自创隐喻体系的方式来促进其论述体系的传播，其创立的一系列隐喻如“大洪水”“内亚武德”“费拉”“巴蜀利亚”“蛮夷”等隐喻，在网络中不断增殖发酵，甚至成为部分网络亚文化群体热衷使用的语汇，以至于在这种隐喻语言的使用游戏中，其本义已经被人遗忘（例如，网络悟道讨论群体非常热爱用“费拉不堪”来形容某些人的武技拙劣）。这显然给“入关学”利用隐喻修辞格来表达观点的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借鉴意义。最后，“数卷残篇”团体的部分核心成员已经不关心其思想观念在社会中的实现，而是关心其“变现”。相对于早期网络议政话题的设置者和实施者，这一团体面临着即便是人文社科的网络议政者，也从简单的同仁团体变成一个大众组织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修辞的“魔力”，吸引拥护者和粉丝，才能让核心成员的力量被政学两界所了解，从而转化为团体首脑获得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助力。实际上，尽管由于其观点的反动性和激进性，在网络审查制度的影响下，“数卷残篇”团体最终解体，但其核心成员或者出国读书，或者在学术界有了基本地位。应该说，这样的策略仍然成为他们“成功”的助力。

但是，“数卷残篇”仍然是“网络政见”到“网络键政”的过渡形态。因为，这批网络议政话题的发起者和实施者仍然和现实政治的关联过于直接；而且，其议政话题仍然试图吸引掌握人文社科领域符号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他们先以大众化的青年文化和社科爱好者为流量，一旦获得了影响力，就与原有流量相切割。而与“数卷残篇”不同，“入关学”从一开始则依赖更大范围的议政群体，其对修辞效能的重视也更为深入。

### 三、隐喻研发和情感激发：“入关学”的修辞技术分析

“入关学”在某种程度上戏仿了此前的论述形态。这种戏仿包含了某种受众细分的考虑。与此前的根据地，以人文社科青年为主的“豆瓣”不同，“入关学”的根据地是以理工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知乎”。与人文知识分子不同，这批受众更多介入中国科技研发和工业生产的演化和发展历程，不容易受到人文社科话语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入关学”的受众不能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和政治形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深刻地体现在“入关学”的“内卷”解释上。

“内卷化”概念来源于康德的“内入”概念。康德将对象a在现实的效果中被对象b的效果所涵纳定义为a“内入于”b。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将之应用到文化组织模式的分析上，将特定

文化模式不断消耗量的积累，却不能转化为高阶模式的困境，称之为“内卷化”。关于“内卷化”的解释和应用极为复杂，需要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去澄清。但是，以“山高县”和曹丰泽为代表的“内卷”解释却直接而粗暴。他们直接进行了这样的推论：

大前提：我们天天 996 做实验还活得这么累，是因为“内卷”

小前提：“内卷”的产生原因，是大明（美国）犁庭扫穴，拿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

结论：我们要“入关”，肢解大明，能过上舒服的生活，有美女作陪，住大 house（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准）

如果按照现代人文社科的理论标准，这样的理解是对“内卷”概念彻底的颠倒。在后者看来，“内卷”是个文化形态学和制度形态学的概念，不去反思运作自身的制度，而直接思考遥远美国“犁庭扫穴”的暴力掠夺，是极度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但是，在“知乎”受众看来，这一看法不仅近乎情理，而且煽动了他们内心最为激烈的情感。与“豆瓣”社区的构成者不同，“知乎”大量的阅读者是接地气的小资产阶级。由于深入地介入全球化的产学研分工，他们能直接观察到这种分工下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自己“付出大于收获的”状态十分不满。与此同时，剧烈的竞争压力和技术劳动不断低廉化、“白菜化”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思索这一不平等背后的原因。相对于更被深度剥夺，且无适应现代产业分工能力的人文社科小资产阶级青年，这些受众是现实主义者，且在全球分工和中国极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分到了更多的利益。所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左翼思想的玄妙和空想打动不了他们，而“抢蛋糕、分蛋糕”的竞争逻辑更能让他们理解。与此同时，这些人能够深入理解的“文科”资源，就是历史。中国是历史大国，而对于许多理工和商科背景的“知乎”用户来说，中学和大学阶段唯一不枯燥的文科教育，就是历史教育，而 20 世纪末以来，《三国志》《文明》和《帝国时代》等战略电脑游戏强化了这些受众通过历史理解现实的兴趣，并激发了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方式在大量人心目中的传播。<sup>①</sup>显然，这种受众很容易受到“入关学”的煽动。

而“入关学”对隐喻体系的执着研发，使得这群“网络键政”爱好者在使用“入关”话语时产生出更大的游戏快感。“入关学”有一套严整的隐喻系统，并随着事实的变化，吸纳网民喜爱的全新隐喻。“入关学”的基础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国内现状的隐喻：极易受国际分工影响，附加值极低，且岌岌可危的工作被称为“摸鱼”；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利润极高，却导致“内卷”和对国民超额剥削的产业，被称为“挖参”；进入全球分工食物链顶端，被称为“住大 house”……类似比喻深入呈现了理工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人生理想和世界图景。第二个层次用来譬喻国际政治现状：美国的绞杀被称为“大明犁庭扫穴”，与俄罗斯的关系被称为“联合蒙古”，日本和韩国被称为“朝鲜”，等等。第三个层次包含着“入关学”的即兴性和创造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比喻会加入进来。比如，应对新冠肺炎，“入关学”提出了“新冠小冰期”和“新冠闯王”概念，以解释新冠肺炎以后“入关学”的新发展，顿时让部分拥趸感受到巨大的心理愉悦。总而言之，这套隐喻体系包含了两种对立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张力却导致了“入关学”在修辞上的吸引力。一方面，“入关隐喻”极度粗鄙，这种粗鄙顺应了近十年网络修辞“屌丝化”的倾向，呈现出中产阶级知识青年对其社会地位的忧虑和痛苦；另一方面，这种隐喻充分

<sup>①</sup> 参考马逸凡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东方学刊》举办的“入关学”现象研讨会上的发言。

吸收了历史情境，并与时俱进，为当代世界形势提供了一种图式化的“历史修辞学”解释。显然，这对“知乎”青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入关学”采取的“不辩经”策略，更体现了“入关学”对说服效能的兴趣远大于对知识体系的兴趣。很多人不能理解“入关后，自有儒学大师为我所用”这句话的含义。这句隐喻体现了“入关学”对自身话语效能的理解。“不辩经”并不意味着“入关学”不争辩，而是说，“入关学”没有固定的理论立场和话语体系，只要能有助于“入关学”胜利和正当性的学术体系都能为其所用。这就意味着，为了“入关学”的成立和“入关学”在“键政”辩论中的胜利，什么表达都可以出现。因此，“入关学”实施者往往采取“爆论”的方式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多次触及种族、文明等级制等议题，公开鼓吹殖民主义的正当性。这样的论述看似危险性极大，却强化了“入关学”敢言人所不敢言的印象，能起到吸引流量、扩大影响力的作用。

因此，在厘定“入关学”的“学术性”或者“正当性”的同时，需要理解“入关学”与网络修辞技术的密切关系。显然，至此为止，“入关学”的主要人物并不依赖其“学说”进入体系化的学院政治再生产之中，最多偶有利用流量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之意。这显然是因为，相对于人文社科议政青年，“入关学”的发起者应有自己独立的上升通道和生活来源，而他们对网络流量的重视，远大过进入现实政治和政治研究领域的诱惑。

#### 四、结论：观风察势，“入关学”修辞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修辞学的意义十分重大。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就从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成为重要的社会操控工具和情感治理手段。柏拉图认为，当时修辞学派的两大始祖是高尔吉亚和色拉叙马霍斯。高尔吉亚讲语言的组织，成为用语言技术说服人的大师。色拉叙马霍斯则善于操控人的情感，他认为，在演说活动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打动被说服者的情感，他并不在乎到底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理。<sup>①</sup>语言和情感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把负面信息解释成正面信息，从而达到说服人和控制人的目的。

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家对修辞术这种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就有所警惕，开始在修辞术里加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道德和风俗维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可以诉诸如下方式实现其修辞效果：语言、情感和习俗/道德规范。<sup>②</sup>这时，对修辞技术的分析，不仅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而且能分析特定修辞技术所依赖的道德规范和情感形态，进而让人更好地理解社会风貌和道德规范的变化。

应该说，对“入关学”的修辞分析，不能简单依靠西方古典修辞学模式的帮助。这是因为，在网络社群中，修辞语篇的制作者不再固定，而受众的回复和对修辞语篇的再解释往往会消解修辞技术使用者的主观意图。但是，就“入关学”而言，这种传统修辞分析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存在。与之前网络议政的话语模式相比，“入关学”显然不那么重视网络议政对现实问题的作用和干预，而更关注“网络键政”论辩中的输赢和吸引受众流量的作用。这就顺应了中国网络议政文化从“网络政见”向“网络键政”模式的转型趋势。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入关学”简单看作一种“与政

<sup>①</sup> Marcus Quintilian, *The Orator's Education*, Vol.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3.

<sup>②</sup>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9.

治无涉”的修辞游戏。一旦涉及政治和社会话题，“入关学”要吸引目标受众，就必须操控政治情绪，从而让相当部分看似无涉政治的人群，获得表达其政治利益和诉求的出口。

这种情绪显然属于“入关学”的受众：并不掌握“正统的”议政“知识”，却需要将其社会困境和世界观表达出来的“知乎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熟悉理工和商科知识，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深刻感性观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大众。这部分读书人对当代世界的平等现状有着极度不满，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安全有着深刻焦虑，却又不满足于在高考分流中处于弱势的人文知识体系主宰了当代网络议政的主流思考方式。而人文社科对于当代中国问题和国际地缘政治的解释无能更坚定了这群“键政群众”的鄙夷。这最终让“入关学”成为这群人有效的情绪宣泄出口。

但是，“入关学”的优势也是其劣势。相对于“粉红”文化、“公知”话语和“女权”话语等网络议政表述，“入关学”始终只能吸收小资产阶级中“反思性”很强的群体。其原因在于，“入关学”的隐喻体系仍然过于依赖历史知识，尤其是军事史和政治史知识，形成了理解的准入门槛；而相对基于政治科学或哲学“知识”的议政模式，它又显得推理不足，其“爆论”迭出，充满政治不正确表达的论述太多，对“蛮族入关史”的梳理又充满虚无主义色彩，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望而却步、不敢沾染，遑论成为“儒学大师”为其辩经。这让“入关”话语最终不能产生更大的修辞效果。

因此，只有通过摒除“入关学”修辞上的劣势，发扬其优势，才能将之与当代地缘政治学说有机结合，发挥其更大的修辞效能。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入关学”更多折射出的是国内舆情治理和公共议政空间只关注政治利益分配和话语斗争，缺乏对政治情感的疏导和代表机制的考察和研究。这种考察和研究的缺位遮蔽了理论界和舆论管理者的视线，使之难以发现大众更为幽微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情感状态，从而丧失获得有效政治动员、深入网络大众社会和发现潜在的文化创新论述的契机。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